

## 鲁迅对宗教文化的价值判断与价值择取

沈 红 华 鄂

具有世界性、群众性与悠久历史传统的宗教文化,有着广袤的覆盖面。它几乎触及到每个人,几乎渗透进人类的各种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中。中国20世纪的文化巨匠鲁迅,也与宗教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检阅鲁迅的日记、书信、杂文、小说、藏书,可知他在幼时就知道了《妙法莲花经》、《大乘起信论》等经籍<sup>①</sup>;留学日本时读过《圣经》,辛亥革命后曾大量购进包括《出三藏纪集》、《法显传》、《华来经合论》、《维摩诘所说经法》、《宝藏论》、《百喻经》等在内的有关著作,还接触与鉴赏过大量的佛像、佛画,购置与阅读过大量中外神话故事——《山海经》、《搜神记》、《列异传》、希腊神话、罗马神话,等等;1925年又先后购得中文本《圣经》与伦敦版英文本《圣经》;1930年还购得德文版的《耶稣受难》、《上帝的化身》两种版画册等等。这浩繁的卷帙不仅给鲁迅以丰富的宗教文化知识,更提供了一个对宗教文化作出价值判断与价值择取的宝库。

### 一、否定神造说, 培倒神正论, 笃信科学及其理性力量, 翻转宗教的伦理价值观

到19世纪,人类社会才真正开始跨进一个科学的时代:自然科学有了突飞猛进,这种种给西方宗教的教义、信条与信仰,以强烈的震撼,尤其对“上帝创造人类与万物”的神造说与“上帝主宰人类”,“人是上帝的奴仆”的神正论,以致命的打击。科学的进步,使人成熟起来。在成熟起来的人面前,宗教化的时代开始成为过去;在成熟的人面前,上帝失去存在的必要。于是渎神者的队伍里,德国诗人、思想家尼采(F·Nietzzsche, 1844—1900)发出震撼人心的呐喊:“上帝死了!”“上帝永远死了,我们把祂杀死了!”<sup>②</sup>留日时期的鲁迅,他吸纳了科学的空气,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与尼采的超人

哲学观,云:“进化论之成,自破神造说始”<sup>③</sup>他否定上帝在第七日完成创造人与万物的迷信,抨击盘古开天辟地与女娲骸骨化为天地的荒谬,云“谓盘古辟地,女娲死而遗骸为天地,则上下未形,人类已现,冥昭瞢暗,安所措足乎”<sup>④</sup>在生命的起源及人与自然宇宙的关系中,鲁迅排除迷信,笃信科学,否定神造说,指出:一切生命来自无生物,“无生物之转有生”是“不易之真理”。<sup>⑤</sup>鲁迅笃信科学、肯定科学的理性力量的态度是坚决的,唯物论的观点是彻底的。在《人之历史》中,他对科学研究中保留神性的不彻底性,提出严厉的批评,指出瑞典生物学家林耐(K·V·Linne)与法国生物学家居维叶(G·Cuvier)未能科学地去解释化石的生成而归之于上帝创造化石的荒唐,指出了他们竟沿用摩西的关于上帝创造万物的说法去解释动物物种之不变的持论的局限。而对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E·Haeckel 1834—1919)的种系发生学的科学性,高度肯定,称其“著书至多,辄明斯旨,且立种族发生学,使与个体发生学并,远稽人类由来,及其曼衍之迹,群疑冰泮,大闷犁然,为近日生物学之峰极”。

鲁迅对神的否定,不停留在对那虚幻的神的存在否定,还进一层对宗教的伦理价值观来了一个翻转。在宗教的伦理价值观中,神是本位,神是人的主宰,人是神的奴仆与子民,神支配着人的世界;神是全知全能的,至高无上的,而人是卑微无能的且生来有罪的。鲁迅对此极力抨击,指出西方历史上基督教国家里,“教皇以其权力,制御全欧,使列国靡然受圈”,“益以桎梏人心,思想之自由几绝,聪明英特之士,虽摘发新理……胥缄口结舌而不敢言”。<sup>⑥</sup>“罗马法王,又竭尽全力以塞学者之口”,“科学隐耀,妄信横行”,“天下为之智昏”。<sup>⑦</sup>人的理性力量与科学不但没有发扬,反而“摈斥天阙之,谓人之

最可贵者,无逾于道德上之义务与宗教上之希望”。<sup>⑧</sup>宗教伦理上的这种荒谬必然引起人们的不满与怨愤。鲁迅举出德国的马丁·路德(M·Luther)起来自创新教,“力击旧教而仆之”,这一宗教改革遍于欧洲,而其影响所至,非独宗教而已,且波及其他人事,“如邦国离合、争战原因,后兹大变,多基于是”。<sup>⑨</sup>鲁迅在此否定神正论,而立人正论;否定宗教的伦理价值观,而肯定人类自身的伦理观:“宗教之改革已,自必益进而求政治之更张”,<sup>⑩</sup>进一步要求政治上的改革。鲁迅翻转宗教伦理的价值观而肯定人类自身的伦理观,并非说鲁迅对人类自身的伦理观不去作价值判断,相反他以后不断探索不断选择而最终选择了一种文化价值体系。早期的鲁迅在翻转宗教的伦理价值时,主要肯定的是人对自然宇宙的认识力量,肯定人的科学的理性力量:“观于今之世……自然之力,既听命于人间,发纵指挥,如使其马,束以器械而用之”,“虽高山大川,无足沮核”,<sup>⑪</sup>人正在征服自然,自然正听从人的意旨。早期鲁迅,在翻转宗教的伦理价值观时,又肯定科学的进步给社会与国民风气的变革带来积极影响。他以“举其身心时力,日探自然之大法”的培根、华莱士等人为证,肯定他们的“仅以知真理为唯一之仪”的这种人的本质量力量与科学精神,是“时泰”时的“人性之光”、“神圣之光”,它能“遇末流而生感动”,如当社会“时危,则由其灵感”,<sup>⑫</sup>产生出治理国家与社会的杰出人物。

## 二、摒弃对彼岸的幻想,重视此岸的人生内容,从宗教文化中择取对生人有价值的精神食粮

在宗教文化里,一个执着讨论的问题是:人的此岸与彼岸的关系,人与社会他人的关系。无神论者鲁迅,则坚决地摒弃对彼岸的幻想,而重视此岸的人生内容,并从现实的社会变革要求出发,从现实的阶级关系状况出发,不依宗教家们那样去抽象地谈行善、爱人,而是敌我友分明,爱憎分明,充分重视人生此岸的具体的世俗内容。他说,人在世“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生命;三要发展生命”。<sup>⑬</sup>具体言之,是从实际出发谋求职业;做一个有进取精神的实行者,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家”;<sup>⑭</sup>要“幸福度日,合理做人”,<sup>⑮</sup>牢牢把握住“现在”,凡事赶快去做;爱应该所爱的,憎应该所憎的,即使自己临死时,对自己的怨敌,“也一个都不宽恕”<sup>⑯</sup>对于死亡,

鲁迅也毫不恐惧,但他追求一份死后的意义。为此,他不同意庄子的对死后“在上为鸟鸢食,在下为蝼蛄食”的随便处置的旷达态度,表明自己死后假如该喂动物,而宁可喂狮虎鹰隼以增添自然界的一份“伟美的壮观”,让人“看了神往,消去鄙吝的心”,而绝不愿去“养胖一群癞皮狗”。<sup>⑰</sup>

鲁迅堵绝人通向神性的道路,并非堵绝他与宗教文化间的联系。他还是从现实人生的需要出发,从宗教文化中择取对人生有价值的为其所用,服务所需。其一是牺牲精神。基督教的“牺牲”,是从“原罪”论出发,《圣经》载有神之子耶稣要代人去赎罪,作出牺牲。耶稣的这种赎罪牺牲,是要实现上帝赋予的责任,而这一行为是在提高神——上帝的威信。鲁迅对耶稣的这种牺牲精神很是感佩。他移用、化解这种牺牲精神到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的革命事业上。留日时表示要“我以我血荐轩辕”,“五四”时表示要“肩着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的地方去”,为青年的新生与未来作出牺牲,颇有与先知者为人受难、牺牲的相似处。到20年代,“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不惜让自己做野草为未来去牺牲,并甘愿野草快快地死亡与朽腐,渴望地火的运行、奔突、喷发,去烧毁所憎恶的以野草装饰的地面——罪恶的黑暗的现实世界。到30年代,他更愿像《铸剑》中的眉间尺那样,献出自己的生命去实现对王者的复仇。其二是“复仇”精神。恩格斯在《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启示录》、《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中,探寻了早期基督教的本来面目,指出其产生时也是被压迫者的运动,是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和驱散的人们的宗教。既是被压迫者的运动,当然地就有反抗、斗争与复仇。鲁迅吸取早期基督教的这种反抗、斗争、复仇的精神,并予以颂扬。在《野草·复仇(二)》中,化用《圣经·马可福音》十五章故事,指出“钉杀了‘人之子’的人们身上,比钉杀了‘神之子’的尤其血污、血腥。”还给受难耶稣平添了一份“复仇”心理,写他不肯喝那用没药和的酒,要分明地玩味以色列人怎样对付他们的神之子,而且较永远地悲悯他们的前途,然而仇恨他们的现在。”在《野草·死后》中又表示即使死后,对“仇敌也……不肯赠给他们,一点惠而不费的欢欣”。鲁迅的这种复仇精神,到30年代,体现在他的“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憎恨中,到他去世前一月写下的《女吊》文中,批评了民间女吊戏中:“单‘讨替代’,忘记了复仇”

的思维模式,探幽发微地申说:“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在杂文《死》中,他表示对自己的怨敌一个也不宽恕,表示了对反对复仇的深恶痛绝。其三,“忏悔”意识。鲁迅肯定基督教中的忏悔意识,在《破恶声论》中,称颂奥古斯丁、托尔斯泰、卢梭们的“伟哉其自忏之书”,是“心声之洋溢者也”。在鲁迅看来,一个人没有忏悔意识,就是缺乏一种自耻心、自剖精神。并且他把它扩展到一个民族的精神品格。深受带有基督教观念的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忏悔意识影响的鲁迅,一生时时刻刻地更无情地解剖着自己。这种颇有宗教情绪色彩的忏悔——自剖,突出地表现在他的《野草》里,其中的《墓碣文》中,墓中人的内心的虚无与灰暗,欲摆脱这种消极心境而不能的焦灼、痛楚,正是鲁迅当时心境的自剖与写照;《求乞者》中有对自己告乞的态度上的忏悔,《影的告别》更敞开自己的阴暗心灵世界,诉说自己的苦闷,忏悔自己的虚无。他忏悔到“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因而“常常诅咒我的这思想”;<sup>⑨</sup>他还忏悔到“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因而“极憎恶地,想除去他”,<sup>⑩</sup>这种忏悔意识与鲁迅和革命精神相联着。他说过:“革命者决不怕批判自己”。<sup>⑪</sup>

罗素说过:“在价值的世界中,我们比自然伟大”,“应该由我们来决定高尚的生活,而不是由自然来决定——哪怕是由人格化为上帝的自然来决定也不行”,<sup>⑫</sup>鲁迅终其一生,是在求科学的进步与民主的进步的现实斗争中,自己决定其生活与选择其文化价值体系的,并由此出发从宗教文化中择取对其有益的价值信条的。

### 三、揭破宗教迷信对人的桎梏,揭破宗教文化的“他律性”,开启人们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意识

同是宗教,在哲学层面上,佛教不同于基督教。基督教哲学涉及世界的起源,人的诞生这样一些根本性问题,并坚持作出其唯心主义的解释。剥削阶级为达到其长久统治、剥削人民的目的,利用宗教教义并掺杂封建迷信、君权神授等观念,来控制与愚弄人民,虐杀与毒害人民。鲁迅以其小说《祝福》,艺术展示了祥林嫂的人生大悲苦,揭示了这场大悲苦的真正根源。

《祝福》中,祥林嫂及其周围的一群,深烙下宗

教信条中关于救赎的印痕,都认为祥林嫂悲苦的根源是因为她“嫁”过两个丈夫而生的罪恶,来自于她的“无明”,来自于她对婆婆的理性认识的蒙昧;并且都相信在自己的经验世界之外,还有一个超验的有别于人生的地曹阴府存在。小说形象地揭示了:祥林嫂与周围的一群除现实生活外,还都生活在一个超现实的独立存在的精神王国中,后者是股异己力量,它与祥林嫂对立地存在着,并桎梏着她的精神世界。列宁说:“宗教偏见最深刻的根源是穷困和愚昧”,<sup>⑬</sup>《祝福》无意去表现祥林嫂的物质贫困,它写到祥林嫂的愚昧,但无意于去多写祥林嫂的救赎与自我沉迷,而注重于祥林嫂周围的一群与她的关联,通过对这种关联的描写,揭示宗教这一社会文化的“他律性”,揭示祥林嫂的宗教心理的“他律性”,也即它与外在社会因素(一向存在的生产与交往的方式)的关联。作品中写到:祥林嫂按宗教的信条,满以为通过救赎,可以洗刷“污秽”,可以得到拯救,可以免入地狱或畜生道,然而,被那封建政权象征的鲁四老爷那一声大喝“放下!”震慑了灵魂,震碎了幻想。超验的宗教偏见桎梏了她,然而又给她幻想与希望,而现实的封建统治——三从四德的封建道德规范与封建主义的政权力量,予以致命的打击,精神既然崩溃,赖以支撑的肉体也很快死亡。至于其他柳妈等人一群,同样也从封建道德观念出发,认为祥林嫂有罪,罪不能赦。这里,鲁迅透过祥林嫂与周围鲁四老爷、柳妈等人的社会联系与精神交往,寻出了宗教这一社会文化的“他律性”的秘密。

马克思说:“我们不是到犹太人的宗教里去寻找犹太人的秘密,而是到现实的犹太人里去寻找犹太教的秘密。”<sup>⑭</sup>鲁迅的《祝福》揭开了劳苦妇女祥林嫂的宗教信仰与现实生活、与社会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的关联。我们知道,任何时代人们的政治关系、伦理关系、思想关系最终取决于社会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一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成一定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的过程。而祥林嫂被封建社会剥夺去财产土地,不能独立耕作后,其物质生产又只能依附于封建统治者鲁四老爷,而失去丈夫、儿子的她又深深地陷在孤独之中,鲁镇上人后来谁也不愿听她讲阿毛的故事,这迫使她到宗教中寻求慰藉,寻求庇护,希望死后能灵魂不死,一家人能团聚。可见,她的宗教意识的产生与加重,并不源于她

原有的自我意识,而是纯粹由她生存的那个社会环境,那种生产方式与交往方式所决定的。另外,《祝福》中所表现出的祥林嫂的对人生世界彼岸向往的失落、其宗教心理归宿的失落,也表明了鲁迅对封建统治的批判与对宗教迷信的否定。

如果说,留日时期鲁迅推崇科学,是希望人类去实现自身的理性力量、本质力量,免堕唯心主义的荒谬的话,那么,他20年代创作《祝福》这一充满人文精神的小说,是让人们看清旧中国社会利用宗教加强对人民的统治的真象与加强对人民精神桎梏的本质,破除人们对上苍的依赖、庇荫心理,开启人民的反封建斗争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意识。

#### 四、漠视宗教仪式与崇拜制度,重视神话研究与创作,为社会的进步发挥其文化力量

宗教的多层面的文化意蕴,除哲学观、人生观外,还保存下了人类自古以来的对超自然对象的崇拜制度与宗教仪式。对此,并非教徒的鲁迅并不顶礼膜拜。1901年《庚子送灶即事》中“家中无长物,岂独少黄羊”的诗句,不只反映了家境的困顿,更表达了鲁迅不想靠神的庇佑求富贵利达的态度。同年作的《祭书神文》更讽刺了大张华宴祭祀财神的钱奴,表现了对宗教祭祀仪式的漠视。到30年代,对国民党当局利用宗教崇拜制度举行“时轮金刚法会”的荒谬与实质,予以深刻的揭露:“绮罗幕后送飞光,柏栗丛边作道场。望帝终教芳草变,迷阳聊饰大田荒”。

宗教除其哲学观、人生观、仪式、制度外,其又一文化意蕴是为人类保存和提供了一份文艺素材与文化食粮。这是为中外古今的文学艺术所早已证明了的。对此,作为人类的一种文化遗产,鲁迅并不拒绝,并且极其认真地对待。这表现为:一、他对“宗教之母”的神话传说,予以整理与研究,写进了《中国小说史略》一书。鲁迅的研究贡献给我们的:1. 对神话与传说,作出了界定:“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神话大抵以一‘神格’为中枢,……为中枢者渐近于人性,凡所叙述,今谓之传说。”2. 指出神话对人类文化的影响:“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3. 否定了中国神话不发达是先民“重实际黜玄想”,“为儒者所不道”的观点,指

出“其故殆尤在神鬼之不别。天神地祇人鬼,古者虽若有辨,而人鬼亦得为神祇。人神淆杂,则原始信仰无由蜕尽”。鲁迅独辟蹊径,从鬼文化角度作出新的论断。<sup>②</sup>二、探讨了六朝前后“混合儒释”、儒佛互补的史实,又指出佛教自传入中国,与中国的巫鬼文化结合后,在它的哲学观人生观里,掺进了神性与鬼气。必须承认鲁迅的这些研究是相当科学的,观点是卓然独识的。

除研究外,鲁迅还采用神话、传说,进行文学创造,有《不周山》(《补天》)、《理水》、《铸剑》、《起死》等,并且显示了鲁迅在此方面文学创造中神话思维的现代性。其一,他坚决地以科学思想为指导,排除封建迷信,将阴曹、地府、鬼魂之类摒除在创作素材之外。其二,古希腊、罗马的神话,尽管予以人格化处理,但总是以“神”为格,讲的是神界的故事;神是世界、宇宙的中心。而鲁迅此方面的文学创作,在《补天》中是淡化神格,在其他篇中是以人为格,使人成为世界、宇宙的中心,充分显示人的本质力量。如《奔月》中把后羿、嫦娥,定格为人。如《理水》,弘扬的是人定胜天、人战胜自然的坚毅精神与调查研究的理性力量。古代神话,对世界的解释不具有科学的理性属性,表现的是人类自我意识的浑沌,而鲁迅的创作则主要是表达主体内心的感知。如《补天》,作者一欲解释人和文学的创造的缘起,二欲嘲讽“含泪的批评家”的滑稽可笑;《铸剑》要表现的是主体对凶暴的鞭挞,对正义的伸张,对复仇精神的颂扬;《奔月》表现主体对人际关系中骗子行为的否定;《起死》表达的是主体对无视真理的客观性的“无是非观”的否定;《理水》表达的是主体的对我们民族的精神,对埋头苦干、拚死硬干的“中国的脊梁”的敬佩与赞颂,表达的是对置民众水深火热于不顾的官场、学者的憎恶。

鲁迅采用神话、传说所进行的此方面的创作,既贡献给我们一个文学“实体”,又提供给我们一种巨大的文化力量:它或以荒诞,或以浪漫,或以隐喻象征,或以生动离奇,表现了人类的丰富的幻想力,显示人类的一种独立创造精神,而为现代人所欢迎、推崇;它又以深邃的隐含意义、鲜明的主体情感力量,对现实世界、对社会现象作出干预与批判,在促进社会的进步与民主的进步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如大禹、后羿、眉间尺、黑衣人等形象,其文化价值在于推进着社会生活中的神圣的一面,正价值的一面,而作品中的有些反面形象则是否定着社会生

活中的负价值一面。概言之,我们从鲁迅的创作中既能获得审美享受,又能从其形象、符号中获得为现代生活、现代文化所渴望的精神要素与情感力量。

在20世纪,鲁迅是以一个争科学的发展、民主的进步的文化巨匠的姿态,在宗教文化方面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并以其对宗教文化的正确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为 中国乃至世界和科学的发展与民主的进步,作出了贡献。尽管我们对今天的中国的宗教文化,观念上也应有相应的改变,而不应以本世纪初期的鲁迅的某些具体观点去对待。然而,鲁迅对宗教文化的科学态度,对宗教的各层面文化意蕴的价值判断与价值择取方面的根本性观点,以及服务于科学发展与民主进步的目的,是完全可取的,是应该予以继承与发扬的。

(作者系上海师大人文学院副教授 邮编:200234)

- ①《且介亭杂文末编·我的第一个师父》。
- ②尼采:《看哪这人》。
- ③④⑤《坟·人之历史》。
- ⑥⑨⑩《坟·文化偏至论》。
- ⑦⑧⑪⑫《坟·科学史教篇》。
- ⑬⑭《坟·我们现在应该怎样做父亲》。
- ⑮《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
- ⑯《且介亭杂文末编·死》。
- ⑰《且介亭杂文末编·半夏小集》。
- ⑱《坟·写在〈坟〉后面》。
- ⑲《鲁迅书信集·1924年9月24日致李秉中》
- ⑳《三闲集·“醉眼”中的朦胧》
- ㉑罗素:《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
- ㉒《列宁全集》第20卷第163页。
- 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6页。
- ㉔《中国小说史·神话与传说》。
- 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40页。

## 一部具有创意的传记

### ——《武侯春秋》评介

一部关于中国三国时期著名的历史人物诸葛亮生平思想的专著《武侯春秋》,近期由团结出版社出版。作者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著名专家朱大渭、梁满仓先生。全书共50万字,二十一章。作者凭借对历史的深厚功力与丰富史料,从诸葛亮生平、经历、人生观、修身立政等方面,分析了诸葛亮的各个侧面,对诸葛亮进行历史的考察和论述。通观全书,透露出作者对诸葛亮的深切体认,对魏晋南北朝史脉络的真切了解,对学术史料的尊重和全面把握。具体说来,此书显现出如下特点:第一,广泛地搜集、利用研究诸葛亮的资料,努力把诸葛亮写深、写透。作者注重把历史人物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中,立足于诸葛亮其人及其思想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时代特征,结合诸葛亮的生平、实践,使诸葛亮的行为发展有真实的历史依据。作者以宏观的眼光、史学的笔墨,将时代与个人两方面结合起来,令人信服地揭示出了诸葛亮之所以成为一个受到千百来各阶层人们景仰的人物,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内涵。根据各史实的内在联系,在纵横两方面探究诸葛亮在三国时的独特地位。众所周知,整个三国时期,诸葛亮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要展现诸葛亮的历史地位,除追究他的纵向的生平外,还要在横向上探究与诸葛亮相关联的刘、关、张,孙吴,曹魏,司马氏及儒、道、佛思想的关系。该书较好地做到了这一点。第二,不落窠臼,力求把诸葛亮写活,写透。作为研究历史人物的著作,该书从自己独特的角度切入历史,无论在总体立意上还是在撰写的方法上,都很有开创性和新鲜感,该书借鉴了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写法,合理地想象,描述情节、情景,力求语言生动,深入地描述、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及内心活动。看似编年体的形式,却象一条绵延的长线,叙述了诸葛亮不凡的一生,呈现出他不同阶段的面貌和特色,全书有考据之功,又有理论分析,实事求是地总结了诸葛亮的一生,没有一般人物传记的模式化,显得生动可读,合情合理。可以说,这是一部具有极强文学性的人物传记作品。就如该书引言所说:“写出一部真实可靠的、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有思想高度、新的诸葛亮传记。”

(国伟)